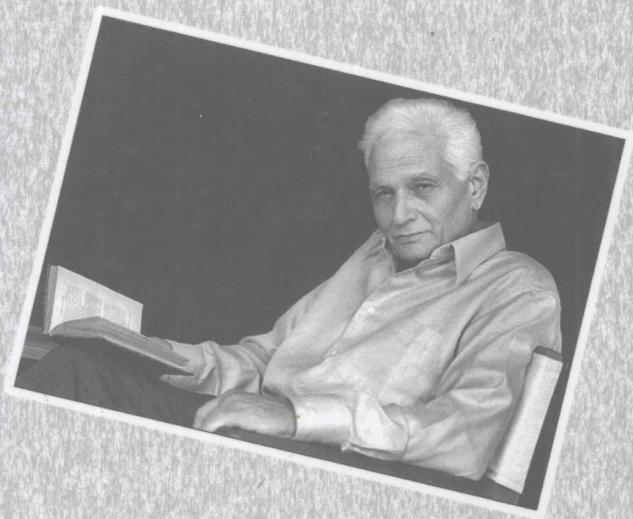


未名讲坛

汪堂家讲德里达

汪堂家 著



Jacques Derrid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讲坛

汪堂家讲德里达

汪堂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堂家讲德里达/汪堂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7

(未名讲坛)

ISBN 978 - 7 - 301 - 14068 - 0

I. 汪… II. 汪… III. ①德里达, J. (1930—2004) -
生平事迹 ②德里达, J. (1930—200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793 号

书 名: 汪堂家讲德里达

著作责任者: 汪堂家 著

丛书策划: 杨书澜

责任编辑: 闵艳芸

版式设计: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4068 - 0/B · 074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02@sina.com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10.125 印张 20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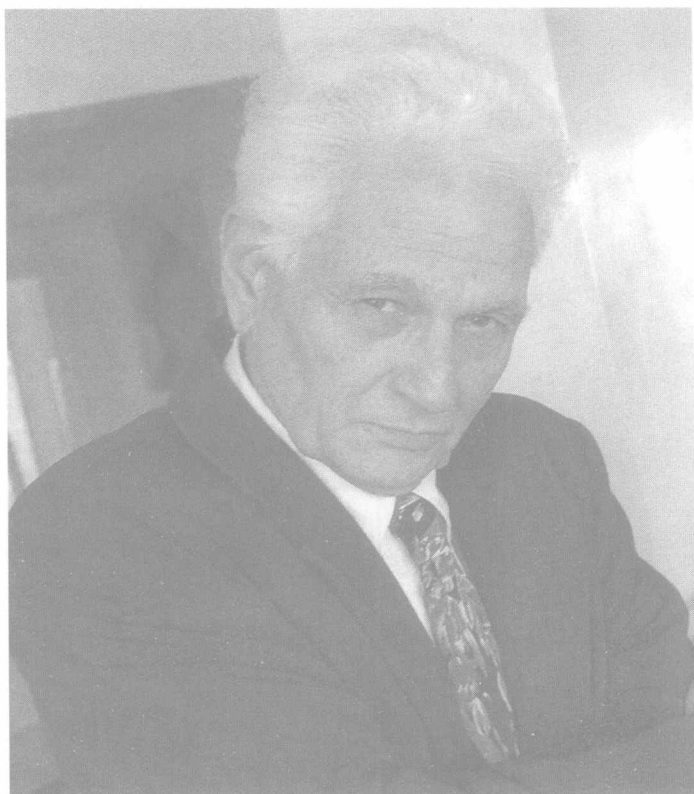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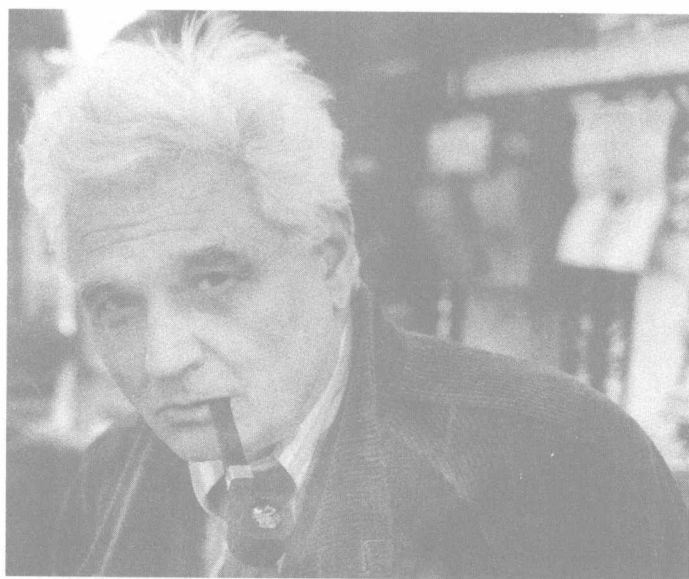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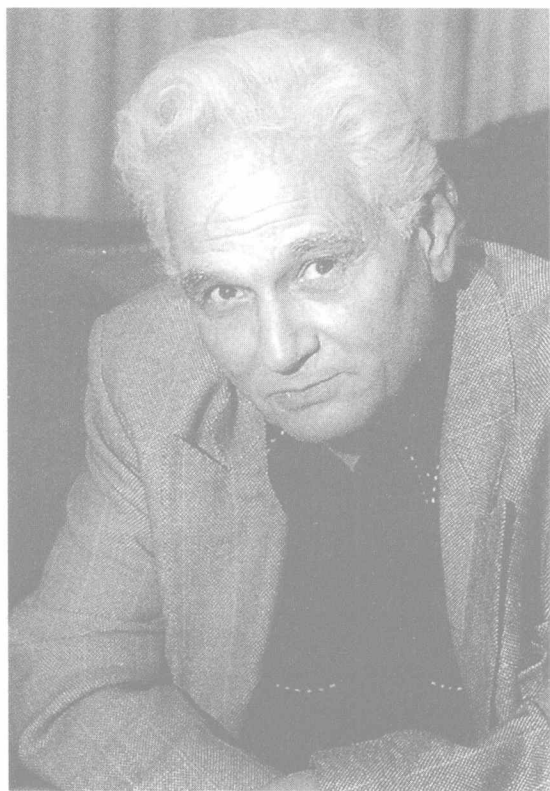


德里达

德里达



德里达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

汪堂家讲

德里达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经受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历史文化的发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这套《未名讲坛》丛书的编写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富于启迪性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未名讲坛》丛书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丛书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的作用,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2005年8月8日

序 言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是对当今世界学术界影响最广,同时也最具争议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之一。自1967年出版《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以来,他出版的论著(包括参编的著作、讲演录和访谈录)达八十余种(见书末的文献目录),影响遍及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人类学、数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所创造的“解构”一词已经成为一种建筑风格和时装样式的代名词并且出现在伍迪·艾伦(Woody Allen)拍的电影和坡利提(Schritti Politti)的通俗歌曲中。以德里达为题材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法瑟(Safaa Fathy)拍摄的《德里达在别处》(*Derrida's Elsewhere* 1999),另一部是迪克(Kirby Dick)和科夫曼(Amy Ziering Kofman)拍摄的《德里达》(*Derrida* 2002)。20世纪70年代以前,德里达一直保持低调,他很少对现实的政治、法律和宗教问题发表看法,也几乎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到了70年代,他一改以前的作风,经常接受一些媒体和学者的专访,他不仅将早年的解构策略娴熟地运用于对政治、宗教、法律等问题的分析并大胆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且不断就建筑、电影、戏剧、媒体、大学改革、社会捐赠、种族歧视、女性主义、恐怖主义、第三世界的饥饿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论题表明自己

汪堂家讲

德里达

毫不妥协的立场。今天,人们给德里达的哲学冠以各种名称,如“解构主义”、“差异哲学”、“德里达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德里达本人则常被人称为“解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新尼采主义者”。但德里达并不接受这样的标签。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对思想史的重新阐释。他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和社会关怀的哲学家。

然而,德里达总是给人一种喜欢批评的印象。他既是思想的批评家,也是文化的批评家,更是当代社会的批评家。他把批评作为思想家的天职。多亏有了像他这样的正直的批评家,我们的社会才对自己的疾病和危机保持着基本的警觉与自省。我把德里达、乔姆斯基、罗蒂和哈贝马斯看做 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牛虻”。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时代拥有这样的牛虻。如果说批评是进步的动力,那么,我们应当欢迎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通过批评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注入活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德里达的哲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他对文化多样性的捍卫,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对形形色色的霸权行径的抨击,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少数民族的同情,对人类思想遗产的珍爱,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殷殷关切,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不囿成见、不畏强权和追求正义的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德里达通过继承以蒙田、笛卡尔和帕斯卡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的怀疑精神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不遗余力的批评时,他同样代表着我们的时代对古典精神的怀念。虽然他提出的某些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嘲弄,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不配称为哲学家,但他提出的一些术语、他的独特思路、语言风格和理论策略已经融入了

当代思想的潮流,并且影响了一些领域的学术走向。

毫无疑问,一个思想家的地位和贡献不一定需要得到政治人物的认可。但是,当2004年10月9日法国总统府向全世界发布德里达因患胰腺癌在巴黎逝世的消息并盛赞德里达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的主要人物之一”时,我们还是感到一丝欣慰,因为它代表了尊重思想的当代法兰西对这位饱受争议的思想家的象征性承认。对五大洲的读者来说,德里达的著作不仅唤起过批评的热情,燃起过嘲笑的欲望,荡起过争议的风波,而且在我们这个经常拒绝思想的多元化的时代里激发过思想的灵感。

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珍贵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先进产品,而是我们拥有为创造这些先进产品所不可缺少的思想自由。对于那些思想自由的勇毅的捍卫者和实践者,我们除了从内心里表达我们的敬意,还需要耐心而细致地研读他们的文本,与他们一块提问,一块思考,一块解答。文有高下,学无中西。我们的民族“自性”与自信虽然离不开我们的文化身份,但同样需要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或者不妨说,这种眼光与情怀应当成为我们悠久的开放文化的一部分。在重新开放的文化中,我们看到了“德里达”这个名字,我们把它看做对这个多元化时代的献礼。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读德里达的一点心得。所思未必成熟,所感却是真切的;所论未必完善,所求却是执著的。虽然我很早就想写一本这样的专著,讨论德里达的那些不易为人把握的思想,但我迟迟不敢动笔。主要原因是,德里达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历史经典的解读并且是非常细致的解读,如果我不将德里达解读过的经典再细致地解读一遍,

就无法判断哪些是历史经典的词句,哪些是德里达的发挥(尽管他本人常说解读就是增益),也无法判断他的解构是否成功。因此,我不得不循着德里达的足迹,将他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将他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而这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我把它看做值得珍惜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在走路中学会走路的,并且,路因常走而常新。我感到高兴的是,自己能通过研究德里达再读一遍经典。

德里达的著作的确是晦涩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创了不少术语,而且表现在他故意采取一种“抵制翻译”的写作方式,好用隐喻以及用同一个词同时表示多种意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幸运的是,除旅居法国的高宣扬先生外,我国学界同人,如,杜小真、尚杰、冯俊、张志伟、张旭、杨大春、余碧平、张宁、刘国英、陆扬、汪民安、赵兴国、陈永国、于奇智、钱捷、方向红、肖锦龙、朱刚、夏可君、周荣胜、胡继华以及其他我无法一一列举的学者,已经在汉语学界做了值得我个人好好学习的相关工作。他们或翻译或介绍或组织一些相关学术活动。他们的观点可能不同,视角可能有别,但他们的名字已经代表了不畏艰涩的努力。我希望,我的这本迟到的小书能稍稍增进我国读者对德里达的艰深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尽管我试图按编辑的要求写得尽可能通俗些,但由于自己尚未达到自由的境界,离通俗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善意地建议一些讨厌抽象的读者可以跳过抽象味道比较浓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一小部分文字曾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和《同济大学学报》上,但做了一些必要的增删。我感谢它们为传播思想提供宝贵的园地。此外,考虑到我国读

者的阅读习惯,我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德里达的“意思”并尽可能引用德里达著作的中译本,但大多对照原文做了核对,有些译文可能做了改动,恕不一一说明。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信任,也要感谢杨书澜女士的不断鞭策。她的艺术化的催稿方式不仅让人感到温暖,而且使人不能不加倍努力。从她那里我更感受到什么叫宽容、耐心与敬业。责任编辑闵艳芸女士对文稿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审读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在此,我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汪堂家讲

德里达

汪堂家

谨识

目 录

第一章	为学的人生	1
第二章	“解构”策略的制定	24
第三章	分延或延异	46
第四章	哲学与教育	64
第五章	文学之思	84
第六章	翻译及其抵制	103
第七章	性别与女性主义	130
第八章	正义的可能性	160
第九章	信仰与知识	178
第十章	为政治立言	203
第十一章	法律的悖论	246
附录	与列维纳斯同行	271
后记		293
文献目录		295

汪堂家讲

德里达

第一章

汪堂家讲

德里达

为学的人生

德里达首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文本，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生活。德里达这位在少年时曾梦想当一个职业足球明星的思想家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他的满头华发、深邃的目光和透出几分刚毅的面庞，也许会使人联想到生活的沧桑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超脱。如果按常规对德里达的一生做个粗略的描述，我们只能说，他的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

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籍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里达因其犹太人身份而饱受欺凌与迫害，他曾两次被维希政府赶出学校。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早在中学时代，德里达就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能，并在《北非评论》上发表过诗歌作品。尽管对文学与哲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德里达对考试似乎很不在行。1947年他在中学会考中失败，随后又在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中两次失败。1952年，尝尽失败滋味的德里达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巴黎高师，并在那里结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他接下来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应部分地归功于阿尔都塞的引导。1953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获得文学与哲学学位并在那里结识了福柯，此后保持着长期的友谊。1956年，德里达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随即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回国后，他又转赴阿尔及利亚服了两年兵役。1959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担任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的助教。四年后又应著名哲学家伊波利特和阿尔都塞之邀重返巴黎高师担任助教，但在助教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恰恰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其中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语音与现象》，以及1972年来出版的《撒播》、《哲学的边缘》等

书奠定了他的解构理论的基础。这二十年还是他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的二十年。1966年,他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讲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随后,他又接受邀请在纽约、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发表讲演。他先后当选为纽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被许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但这二十年也是他在国内哲学界备受排挤的二十年,是他在哲学的边缘游走的二十年。当他申请接替利科的哲学教授职位时先是受到法国教育部长的阻挠,继而受到原本推荐他的法国同行的否决。这并不是因为他处理人际关系太过糟糕,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太离经叛道,难以为正统哲学家所容纳。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哲学的边缘》来形容他在当时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这位几乎成为“制度化的哲学”的牺牲品的哲学家最终还是为尊重思想、尊重思想家的法兰西所承认。法国的许多媒体一直关心和报道他的思想走向。1981年底,德里达在布拉格主持的“主体的政治问题”的讨论班因宣扬自由思想而遭到捷克当局的查禁,正当德里达准备回国时,捷克当局派人在德里达的行李中偷偷放入一些毒品并让海关查到这些毒品,随后德里达被逮捕入狱。按当时捷克的法律,德里达至少要在监狱里呆上两年并且不准保释。此事很快被法国总统密特朗得知,他责成法国外交部全力以赴与捷克当局交涉,确保将德里达释放。事情的真相很快被查清,德里达被无罪释放。这件事倒是帮了德里达一个大忙。他因捍卫自由思想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尊